

太平天國之興亡與美國之關係

鄧 嗣 禹

太平天國之興起，與美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太平天國的滅亡，也與美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是本文的開場白與結論。要知究竟如何，可從下列三方面着眼。

(一) 太平天國與美國傳教士的關係

洪秀全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假如在他參加的幾次科舉考試中獲得一個秀才或舉人的頭銜，他可能成爲一個舊式的官紳，過着舒服的生活。不幸經過幾次失敗，憂愁成疾，演成半瘋狂的病態；然而仍無革命的勇氣。他雖然往來于家鄉與廣州之間，目睹鴉片戰爭以後廣州三元里等地人民排外的暴動，卻從未見洪秀全參加這些民衆運動的記錄。相反地在一八四三年排外高潮的時候，他卻閱讀了多年前得到的九本小冊子，署名勸世良言。從這部書中，獲得些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義，因而進行傳教運動。爲着打破偶像及孔子牌位，也打破了他自己教私塾的飯碗。既無職業，仍無勇氣革命，反在一八四七年間，去廣州依賴外國人，從美國一個傳教士羅孝全 (I. J. Roberts, 1802—1871) 唸聖經，終日鞠躬維謹。學道兩個多月，他想受洗禮；更希望受洗禮後，能在教會裏，求得一個固定的職業。若是成功，洪秀全可能成爲傳教士的助手，過着平淡的生活，用不着革命了。不幸這位教士，自己未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性質孤僻，一生難與其他傳教士及美國教會合作，（註一）所以一聞洪秀全想在教會中找工作，作爲受洗禮的條件，馬上斥他爲謀求飯碗計的基督徒。不給他施洗禮，叫他離開教會。此舉對於洪秀全的影響很大。假如他繼續研究聖經二三年，他後來的太平天國，可能符合教義，得着國際輿論的景仰與援助。

註一：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Ed. by Dumas Malone, New York, 1935.

求功名不成，進而學道；學道不成，謀生無術，進而造反。利用各種秘密社會，與水陸強盜等組織，隨着社會經濟政治腐敗的狂瀾，洪秀全在幕后看風轉舵。所以一八五〇年左右廣西混亂的局面，北京的京報與西方外交官在中國所得到的情報，多說是會匪的活動。最初一個美國人在一八五一年十月六日，提出洪秀全的大名，報告他的宗教歷史，在天堂見上帝的故事，並嚴正的指出，說洪秀全是基督教徒的革命運動者，這個人乃是羅孝全牧師。（註二）

羅牧師很興奮的說：「中國要革命了，要基督教化了，廣大的人民羣衆要得救了。全世界各國的教徒，當用最大的努力，助主完成這個大革命」。（註三）

同時洪秀全也在想念羅牧師。太平軍佔領南京後，洪天王希望羅牧師至京，襄助精神與外交方面的事務。

太平天國的基督教運動，經過羅牧師的宣揚與軍事的實際發展，引起很多外國人的同情。好幾位傳教士，皆冒險去南京未成功；在鎮江勾留幾天，覺得很滿意。冒險觀光南京的傳教士之一，是丁韋良（W. A. P. Martin），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畢業生；他寫過三四封信，要求美國政府，承認太平天國。第一封信，要求美國嚴守中立。第二封信，他把太平天國運動與英國克林威爾（Cromwell）的清真基督徒相比較，預言洪秀全在兩三年內一定成功，中國可成爲美國最大的商場，所以美國與其他國家，一定不要援助清朝。爲廣宣傳起見，他將他的信件在上海華北先驅報發表。（註四）

主張承認兩個中國政府之始作俑者，丁韋良是其中之一。遠在一百多年以前，丁氏發表他的第四封信，建議英美法三國「承認南京的新政權，同時也承認北京的舊政權」。他請求美國趕快派大使去南京，送禮物給洪天王，一如英國送禮物給乾隆皇帝一樣。他的目的與用意，是不是重南輕北？不，他是兼相重，交相利。他着重南北兩政府的對抗，而美國乃可坐收漁人之利。他說「南北兩政府作殊死戰，可以促進工業，農業與商業的發展，從而可以減少俄國的侵略」（註五），這是一種經濟理論與外交詞令。實際的用意，是如他所說的「使中國分裂而控制之“divide and conquer”的策略，可用

註二：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February, 1853) pp. 67-70; and 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20, 1853.

註三：Roberts' manuscript report, p. 3, in the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註四：North China Herald, June 7, 1856.

註五：同上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以打破東方孤立排外主義的城堡，更容易玩弄這兩個敵對的王朝」。西洋人既從滿清政府取得了沿海貿易的權利，就不難要求太平天朝，開放長江流域及其支流，讓外國人通商貿易。北京主宰必予同樣特權，以便爭取歐美各國的資助，所以丁韞良主張美國承認南京政權，愈早愈好。可惜他的信件，不能直接寄呈國務院，因為美國當時有法令，禁止它的公民訪問南京，或援助革命叛徒；而祇是間接寄給曾經簽訂望厦條約的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時任美國政府的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了解中國情形。又在上海的英文報上刊登，以廣宣傳。（註六）

丁氏寫信的效果如何，很難判斷。據他後來的回憶，他的意見，影響美國駐華外交特使伯駕（Peter Parker, 1804—1888），使伯駕成為太平天國的黨羽（Partisan），因而遲延了美國的干涉。（註七）另據當時的報告，有批評丁氏不成熟的意見，當小心接受。（註八）在一八五八年的時候，也有傳教士目太平天國運動，在慢慢死亡的道途中。

但是太平軍在一八六〇年春，打了幾次大勝仗，消滅了清軍的江南大營，天京二次大解圍。於是有些趨炎附勢的外國人，對於太平天國又是刮目相待。是年六月，三位美國教士去蘇州見李秀成，對於太平天國的報告，又轉好了，說他們的政治軍事，比較大清帝國要進步。（註九）可是這三位教士中之一，名花牧師者（The Reverend J. L. Holmes），鼓其餘興，從蘇州至南京，住了八天（八月七至十五），要求以私人資格面見天王，未成；改由章王林紹章接待。在私人閒談中，章王提出關於外國機器的問題，花牧師不高興，以為章王瞧不起他；凡是外國人，就是製造或修理機器者。又因為天王的詔書中，稱他們為外族（Outer tribe），也使這位青年牧師不高興。他看見太平朝上的官員，用烤豬肉祭上帝，作禮拜，祭祀之後，大享口福，更不高興。于是他離開南京，寫一封長信，登在華北先驅報。他說「我此次到南京訪問，本預期得到良好的印象。

註六：North China Herald, June 7, 1856; June 13, 1857. 丁韞良主張兩個中國的理由，都在此長函中。

註七：Senate Documents, No. 22, pp. 921-922; W. A. P. Martin, Cycle of Cathay (New York, 1896), p. 133.

註八：Henry Blodget's Letters, Shanghai, May 29 and December 26, 1858; and John B. Littel, "Missionaries and Politics in China — The Taiping Rebell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3 (Dec. 1928), p. 590.

註九：這三位都是美國南部浸信教徒 Baptists: T. P. Crawford, J. L. Holmes and J. B. Hartwell. See L. S. Foster, Fifty Years in China (Nashville, Tenn. 1909), pp. 109-112; and Missionary Herald, Vol. 56 (Dec. 1860), p. 371.

其實上次到蘇州所得的良好印象，是引起我到南京一行的興趣。我離開南京，觀點大變了。我很傷心地找出他們毫無耶蘇教的色彩，徒擁虛名與假冒行道而已。」(註一〇)

這一篇文章，給太平天國一個大打擊。這時候洪仁玕作資政新篇，企圖將中國現代化。並預先將幾部抄本送給西方外交官，以新他們的耳目。剛剛把國際輿論改善一點，想不到花牧師戳穿紙老虎，給天國一個很大的反宣傳。

聊以自慰的是洪秀全從前的宗教老師羅孝全，經過幾次失敗，終于一八六〇年十月，達到南京。洪秀全優待老師，使他豐衣足食，並聘他作外交顧問，住在洪仁玕的王府中。關於基督教的道禮與儀式，天王與羅孝全不能同日而語。兩人皆性質倔強，教育膚淺，偶用書面爭論，洪秀全就說，他常見皇天上帝，羅孝全無此神權，免開尊口。兩人關係日趨惡劣。住了一年多，羅牧師藉故離開南京，對於太平天國大事攻擊，說洪仁玕當他面前殺了他的僕人，扣留了他的行李，所以脫離南京時，莫名其妙。同時暴露天國與天王種種的腐敗與黑暗，使全世界人唾棄太平天國。並捏造謠言說太平天國反對國際貿易，所以羅氏請求凡是歐美各國想在中國發展商業的，應及早設法，把太平天國消滅。(註一一)

羅孝全這個惡劣的宣傳，對於太平天國的打擊，遠較花牧師為甚。他是洪秀全的宗教導師，一向是太平天國的熱心贊助者，最近在南京住了十五個月，深知宮庭內幕，故他的惡言，非常有效力，使人信以為真。羅孝全給英國外交政策一大臂助，因為一八六〇年八月，太平軍進攻上海，擾亂英國在華的商業中心，英國早想撕破中立政策的假面具，實行武裝干涉，苦于國內輿論不甚贊成。羅氏之惡宣傳一發出，華北先驅報當日即寫一社評說：

我們相信〔羅孝全牧師之〕評論是確實的。當這些消息傳到英國的時候，一班人必放棄對於太平天國運動廣大的同情，從此我們〔在華〕的海陸軍當局，可用武力，毫無拘束的，對上帝與人類的敵人進攻了。(註一二)

不用說華北先驅報的後台老板是英國，羅孝全主張西方進攻太平天國可謂洽合孤意。但是後來羅孝全說，洪仁玕的僕人並沒有死；他的行李，數日後就寄至上海，太平

註一〇：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 1860 參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中冊，頁九三二至九三三 (1958 ed.)。

註一一：羅氏此文，書于一八六二年正月廿二日，先在 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 (Feb. 6, 1862) 印出，後又在 North China Herald (Feb. 8, 1862) 登載。他鼓勵西方以武力進攻太平天國，見于 China Mail, April 10, an extraction is in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of China, LXXIII (375), p. 5.

註一二：North China Herald, Feb. 8, 1862.

領袖並送給他一百兩銀子合一百三十六元。可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是太平天國的興亡與美國傳教士的關係。

(二) 太平天國與美國外交官的關係

美國外交官最初與太平天國接觸的是伯駕 (Peter Parker)，他的繼任者馬紹爾 (Humphrey Marshall) 批評他對於太平天國過於表同情。(註一三)然而那是革命開始不久的時期。受過陸軍軍官學校與法律訓練的馬紹爾，抵華不久，就想去南京考察。一八五三年四月二日，從上海出發，但因船大，又不識水道深淺，觸石折回。四月七日太平軍占領揚州後，恐繼續進攻上海。馬紹爾與法國共同發出宣言，謂美法外交代表有保護兩國僑民在租界中之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無論任何軍隊不許侵入租界。這種宣言，為上海武裝中立之嚆矢。(註一四)當時英國以實力強大，不願意與美法合作，故未加入共同宣言。本來美國國務卿馬西 (Marcy)，訓令馬紹爾保持不干涉政策，可是馬氏自始就認為太平天國不足與謀。一八五三年七月四日兩江總督怡良在崑山盛宴美國特使馬紹爾，因此滿清政府給他一個良好的印象。所以他對國務卿提議，承認南京為事實上的政府，北京為合法的政府。但希望北京能給予美國通商與傳教的自由，長江開放，讓汽船航行，並讓美國公使，駐在北京。(註一五)

後來馬紹爾更進一步，于一八五三年七月十日，正式請求華盛頓放棄中立，採取干涉政策，使中國趨于和平安定之途，並趁此機會，擴大條約權利。(註一六)

但美國在上海的海軍少將培慮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大不以馬氏的政策為然。他以為太平領袖與美國的摩爾們教 (Mormon) 相彷彿，是為改良宗教與政治地位而奮鬥的。美國當嚴守中立不干涉的態度。因此美國在華的海軍領袖與外交官大鬧意見，不合作，不撥給馬氏任何一條船，作為外交官乘坐之用。培慮說，他需要所有的船隻，為開放日本作後盾。(註一七)

註一三： House Doc. No. 123, pp. 198-199 and No. 121, Marshall to Marcy, Shanghai, July 6, 1853.

註一四： Bayard Taylor, *A Visit to India, China . . . in 1853* (New York, 1854), p. 312.

註一五： House Doc. No. 123, pp. 125, 127, 167-168.

註一六：同上， pp. 203-209.

註一七： Chester A. Bain,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Humphrey Marshall,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3 (May, 1951), pp. 258-270.

在美國一般的輿論，如紐約時報等社論所表現的，也不以馬紹爾的祖護滿清政策為然，並且批評得相當利害。(註一八)不久美國的總統，便把馬氏撤換了。馬氏在華約一年，堅持表面中立而實際衛護清廷反對洪揚的政策，在太平天國革命期間，始終未變。馬氏在華時，嚴禁美國傳教士如羅孝全丁韞良等至南京，違者可根據一八四八年的律文，凡美國公民幫助叛徒反抗與美國建交之合法政府，可處死刑。(註一九)

馬氏繼任者為麥蓮(Robert M. McLane 公使)。國務卿訓令他承認太平朝為事實上的政府。抵華後，他要求親去南京考察一次，然後執行訓令。(註二〇)一八五四年五月廿二日，麥蓮公使帶領隨員，其中多中國通的傳教士，乘軍艦由上海首途，廿七日抵南京，麥蓮本人未與任何太平官佐見面，但其隨員則自由考察，且讓太平軍及當地人士上船參觀。隨員所得的報告，有好有壞，而以後者居多。一般印象以太平官員多愚笨不識字，為中國最低級之人民(The dregs of the country)。(註二一)

考察的結果既如此，麥蓮決定不執行國務卿的訓令，而繼續馬紹爾的政策。他認為與太平朝辦交涉謀利益，遠比清朝皇帝為難。美國總統既給予他臨機應變之權，據他在當地所見所聞，他的決策祇能與清朝皇帝往來交涉。(註二二)這樣的決定，美國對太平天國的態度，就再沒有甚麼改變了。在一八六〇年代，美國的勢力遠不及英國，又加國內有內亂，不能在國外有重大的舉動。然而英國在中國用堅船利砲的威脅，美國國家及其公民，皆樂於合作，予太平天國一重大打擊。英國在中國所得到的利益，美國皆不戰而獲。所以 Owen Lattimore 說美國是 hitchhike 的帝國主義者。(註二三)

(三) 太平天國與美國「飛將」之關係

「飛將」者為 Filibuster 一部分譯音，其意義為不務正業，非法冒險之徒，參加國外戰爭，志在謀財致富者。為客氣典雅計，當稱洋將，但實際說來，他們在中國與外國，皆無正式將軍之資格與官銜。無以名之，稱為飛將，微符名實。

註一八：New York Times, June 10, 13; July 2, 11, 12 and 19, 1854; and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79 (July, 1854), p. 185.

註一九：House Doc. No. 123, pp. 182-188.

註二〇：Sen. Ex. Doc., No. 901, 36th Cong., 1st sess., 1853, p. 39; and S. Doc. No. 22, p. 19.

註二一：Dispatches from U. S. Ministries to China, micro-film, Roll No. 10.

註二二：House Doc. No. 22. pp. 415-416.

註二三：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N. Y. 1944) 121.

美國飛將之一為華爾 (Frederick T. Ward)，生于美國麻沙洲沙瀾 (Salam) 港。少年受過一點軍事訓練即東遊西蕩，彷彿日本的浪人。曾參加墨西哥與歐洲克里米亞等戰役，也曾投效法軍，又曾助其父經商，皆不安于位，不久于職。一八五九年，聞中國內亂，可以大發橫財，甚至于在中國建立王國，過皇帝癮。乃隻身航行至上海，兩手空空，莫名一文，時年二十八歲。原為好奇心所驅使，想參加太平軍。但抵上海後，適值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太平軍謀攻上海。上海巨商大賈，惶恐萬分，求外援不成，願以高價，練兵自衛。華爾適逢幸運，為富商楊坊所羅致，轉薦于上海道台吳煦，令其組織二三百在滬濱的國際流氓軍隊，其中多菲律賓人。飲食僱俸，一概從優。不久進攻太平軍佔據的松江，先敗後勝。楊坊與華爾約，每克一城，任其擄掠奸淫，並另發犒賞巨金，以資鼓勵。種種優待條件，在華爾心中，當甚滿意。(註二四)其他美國「飛將」(Filibusters)如富爾思德 (Edward Forester) 與白齊文 (H. A. Burgevine) 等，皆躍躍欲動，相率加入華爾集團，任華爾助手。(註二五)楊坊更以其女妻華爾，于是內助外助，酒色財寶，皆不虞缺乏。每遇戰役，醉兇兇的飛將洋兵，挾其優良武器，一往直前，少有顧慮。得松江後，截斷滬杭交通，予太平軍一嚴重打擊，上海的官紳，大喜過望，而上海英美的海陸軍當局，仍輕視這一羣烏合之眾的冒充軍人，且與美國一八四八年的禁令，顯相違背。然以英美各國，屢稱遵守中立政策，又怕太平軍佔領上海，不便公然馬上撕毀假面具，武裝干涉。得華爾一羣醉鬼，橫衝直撞，等于變相的、間接的武裝干涉，所以英美海陸軍當局，祇有開一隻眼，閉一隻眼，表面上拘捕華爾等人，禁止他們的活動。實際上暗中接濟軍火，任其自由行動，而英美兩國又互相猜忌。(註二六)

在此種國際情勢之下，華爾慢慢的得到英人的諒解，擴大軍隊的組織，改用中國兵員為基礎，與太平軍激戰于嘉定、青浦等處，屢建奇功。雖華爾、白齊文等屢次受傷，傷甫愈重上戰場。清廷獎勵戰功，譽為常勝軍。擴充至五六千人。至一八六二年，英國海陸軍已與常勝軍公開的在戰場上合作，無復中立政策之謬言。但在一八六二年九月，華爾在浙江慈谿督戰，受重傷。臨死以前，立了遺囑，謂吳煦楊坊欠他十五萬兩銀子，

註二四：Holger Cahill, *A Yankee Adventurer* (N. Y. 1930), pp. 1-60.

註二五：D. C. Macgowan, "Memoir of Generals Ward, Burgevine and the Ever-conquering Legion", *The Far East*, N. S. Vol. II (Jan.-June, 1877) pt. I, pp. 102-108; pt. II, pp. 119-124.

註二六：*North China Herald*, August 4, 1860; and Cahill, *A Yankee Adventurer*, Note 4, pp. 145-154.

除給其妻五萬元外，餘歸其兄及妹，要美國公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代為催討。來時兩手空空，兩年多以後，居然有十五萬兩餘款，可見致富之速。此欠款來源不明，遺囑證據不足，中美交涉約四十年，遲至庚子賠款條約簽訂時，中國沒有法子，付還華爾之妹二十萬元，其中包括四十年來的利息。(註二七)

華爾的承繼人大成問題，他的遺囑，要以美國人富爾思德 (Forester) 接管常勝軍。富氏曾為太平軍的囚犯，以身體健康問題辭職。經過許多波瀾曲折，才以美國第二位飛將白齊文繼統常勝軍。白為法國軍人子，移民美國後，他實際上只受過高中教育與短期的軍事訓練，即在各處找事謀生。曾充國會送信傳言的童僕，認識當時的國會議員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又曾經過商，從過軍，及其他的短期工作。總因無耐性，不能久安于位。最後乃想去中國，因為上海是西洋年青冒險者的天堂。白齊文勇敢善戰，能與士兵同甘苦共患難。接統常勝軍後，屢立奇功，大敗太平天國的慕王、聽王及主將鄧光明。數月以後，肅清上海附近。可是白齊文性質，不像華爾一樣的能與他的中國上司發生友愛關係，也不容易與他的中西同事合作共處。他接管常勝軍以後，有一位與他相識的衛三隈 (S. Wells Williams) 牧師說他不能勝任其職 (incapable)，所以有兩個英國人荷蘭 (Holland) 與科克 (Cooke) 被英國駐滬的軍事長官派去幫助他。(註二八) 其中實際的背景，很顯然是英國人從中搗亂，要奪去常勝軍的領導權。利用李鴻章去拆白齊文的臺。李鴻章減少常勝軍的人數，命令他去攻打南京，可是兩三個月不發軍餉，以致常勝軍中有譁變的危險。缺少耐性的白齊文，從松江趕到楊坊家中，把四萬兩銀子的軍餉，命衛隊強行搬去；在口角中，並毆打楊坊。李鴻章馬上把白齊文撤職拿辦，時為一八六三年一月四日。若沒有英國人作後盾，他也許不會採取這樣斷然的手段。白齊文到北京上訴，他的老朋友美國公使蒲安臣替他疏通說話，甚至英國公使也作調人。於是恭親王奕訢諭李鴻章說：「如白齊文到滬，實係悔過認罪，即由貴撫查照辦理」。(註二九) 李鴻章公然不聽總理衙門的訓令，仍不准白齊文復職，因為他有駐滬英軍提督施佛立 (Staveley) 作後盾。施佛立將軍要把他的親戚戈登 (Charles George

註二七：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1917), Vol. II, pp. 82-83.

註二八：The Middle Kingdom (Taipei, photo-reproduction of the 1883 revised edition), p. 609.

註二九：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局出版）頁三二一。

Gordon) 統帶常勝軍。(註三〇) 白齊文沒有法子，投歸太平軍，終日醉昏昏的。派他去上海買軍火，物色其他洋將。他用錢如水，而使命未圓滿辦到，所以太平領袖也對他失望。他異想天開，私與戈登約，願與戈登合作，以一支軍隊打到北京，建立在他們手下的獨立王國。他可以實現作皇帝的夢想。這種計劃，他也對在太平天國中任事的英國人林利說過。戈登與林利皆不以他的計劃為然。白齊文不顧一切，居然組織獨立軍，在蘇州與清軍作戰；太平軍與白部西人，多不滿意，士無鬪志，失敗。(註三一) 戈登勸白離開太平軍，擔保他的安全，從之。後來上海美使館強迫白齊文返回美國，永遠不許再返中國，他不得不聽命，但只在日本橫濱等城，鬼混一年多，並未回到美國去。太平天國失敗後，潛回福建廈門等地，想加入太平殘部。終于被執，在押返蘇州途中，說是覆舟溺斃。這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我們所當注意者是一般人目常勝軍為擊敗太平天國的主力。遲到一九二七年一位在長沙耶魯中學教書的教士赫羅 (William James Hail) 作了一本書，名叫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才把曾國藩在此役的重要提出來。(註三二) 可是到現在仍有若干西洋學者，認為常勝軍是打敗太平天國的主要力量。若讓李秀成佔領上海，得到豐富的財源與軍火的接濟，後事不堪設想。然而組織常勝軍，擊敗李秀成三次攻滬的戰爭，華爾與白齊文兩人，確實有很大的貢獻。戈登接統已經腐敗不堪的常勝軍，已不在上海附近作戰，上海已安若磐石。所以從宗教、外交與軍事三方面看，太平天國的興亡與美國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是否言過其實，請讀者多多指教。

註三〇：A. E. Hake, *The Story of Chinese Gordon* (London, 1891), pp. 55-56; and J. H. E. Wortham, *Chinese Gord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33), p. 72.

註三一：Lin-Le, *Ti-Ping T'ien-Kwoh*, pp. 642-44.

註三二：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Summary)

S. Y. TENG

This essay attempts to show a considerab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ree respects: American missionaries, diplomats, and "filibusters".

From the first point of view, Hung Hsiu-ch'üan was not a born rebel or revolutionary. Had he passe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obtained a higher degree, he would have become a Chinese bureaucrat or a member of the gentry class. Though deeply frustrated by examination failures and in a tortured state of mind, he did not join the mob in any anti-foreign activities in Canton. Instead he went to study the Bible in 1847 under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 J. Roberts, for about three months. His desire to be baptized and given a steady job in the Church was declined by Roberts. Lacking the means of making a living, Hung Hsiu-ch'üan was compelled to rebel in Kwangsi. Most informants confuse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ith a secret society or bandit uprising. The first Westerner to clear the myth and pointed out to the world that the Taiping rebellion being a Christian movement was I. J. Roberts. He even predicted the Taiping success and called for Western support. Many missionaries including W.A.P. Martin tried to visit their Christian brothers in Nanking. Martin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ognize the Taiping Kingdom as well as the Peking regime — a two China policy. Later on in 1860 the Reverend J. L. Holmes visited Nanking request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Heavenly King, Hung Hsiu-ch'üan. When his request was not complied with, the irate missionary published a sharp criticism of the Nanking regime in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ortly after, I. J. Roberts was invited to Nanking by his former pupil to serve as a religious mentor and diplomatic adviser dealing with foreign visitors. Unfortunately the affectionat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degenerated into enmity as both were quick tempered and obstinate. After staying on for fifteen months, Roberts had a quarrel with Hung Jen-kan, a cousin of the Heavenly King, and left Nanking in a panic. He published articles not only discrediting the Taiping leaders but suggest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wipe out the Kingdom. This suggestion was heartily welcomed by the British thereby changing their policy of "neutrality" to intervention.

Second, the relation between American diplomats and the Taiping regime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American minister, Peter Parker, was favorably impressed with the rebels. His successor Humphrey Marshall however criticised him for being over sympathetic with

the insurgent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y, instructed Marshall to recognize Peking as a government *de jure* and Nanking *de facto*, Marshall placed the foreign settlement in Shanghai under western military protection and formally recommended a policy of non-recognition of the Taiping Kingdom. Although the American naval authority in China under 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 disagreed sharply and quarreled with Marshall, the latter being in charge of diplomatic affairs maintained a policy of neutrality in name and a pro-Manchu policy in fact. He even forbade American citizens to visit Nanking on the penalty of death.

Marshall's successor, Robert M. McLane, was again instructed by the Secretary to recognize the Taiping Kingdom as a *de facto* government. After arriving in Shanghai, McLane insisted on making a trip to Nanking before carrying out his instructions. His on-the-spot study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aiping officials were mostly illiterates, "the dregs of the country". He decided to follow Marshall's policy. Thereafter there was no further change in the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Taipings.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British was kept up and finally the Anglo-American support of the Ch'ing Dynasty was to deal the Taipings a severe blow.

Third, the part played by American "filibusters" such as Frederick T. Ward and Henry A. Burgevine is dealt with. When Shanghai was threatened by the Taipings, the moneyed class and foreigners were frightened. The banker Yang Fang employed Ward to train a mixed corps consisting of Filippino and other foreign mercenaries to battle the Taipings. Being better paid and armed than the Chinese soldiers, they won a number of victories. As an encouragement, the Manchu court granted to the force the title of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several defeats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the rebels. Ward was killed in September 1862. Before he died he did not forget to claim that Yang Fang and the Shanghai *taotai* Wu Hsü owed him some \$150,000, a wealth he accumulated within two years from his penniless condition on first arriving at Shanghai.

After much struggle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authorities, both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a successor to lead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from their own nationals. Burgevine, a high school graduate with some military training, eventually secured the job. He was not only a good fighter but also an efficient commander who could share hardships with his soldiers. However, he could not get along with his superiors especially Li Hung-chang. For accepting some 40,000 taels of silver from Yang Fang's bank to pay his troops, he was dismissed and replaced by a Briton, C. G. Gordon.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was successful at least in preventing the Taipings from taking Shanghai. If Li Hsiu-ch'eng had taken Shanghai, the Taipings could have been able to purchase weapons and ammunitions, recruited foreign fighters and accumulated money from custom duties and other sources and the Taiping history would have been a different one.